



人文奥运

—2008年北京奥运会盛事全方位解读

◆ 主 编：郭明强



体育科学出版社

00 882210

人文奥运——2008年北京 奥运会盛事全方位解读

主 编 郭明强

下 卷



体育科学出版社

第五节 第2届远东运动会刮起的文化新风

1915年5月15日下午2时30分,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国上海的靶子花园,即虹口娱乐场隆重举行。中外来宾约2千余人出席。除中国、菲律宾、日本三国的运动员以外,马来(马来西亚)、暹罗(泰国)也派了代表出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办国际性的体育运动会。它不仅表明中国人对现代体育的兴趣迅速提高,而且标志着现代体育在整个东方进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组织者显得既兴奋又紧张。大会开始前,先由运动员分别按国籍排列于场内东首,各向本国国旗行鞠躬礼。然后进场,全体运动员肩并肩稳健地前进。至主席台前,队伍停止,向主席台致敬。主席台上的官方代表席有许多地位显赫的人,包括中国的外交大臣伍廷芳博士,他还兼任远东体协的会长,菲律宾的特派员德·维拉先生、总领事萨罗曼斯,名誉主席王正廷博士,以及许多其他知名人士。

运动员进场后,面向主席台排成两列横队。菲律宾的运动员站在右侧,日本运动员站在左侧,中国运动员站在中间。大会由远东体育协会会长伍廷芳主持,先由沪海道尹兼外交部特派交涉员杨小川代表北京政府袁世凯总统致祝辞,然后是王正廷代表副总统黎元洪致辞。接着是举行运动员退场仪式。走在前面的是日本队,然后是菲律宾队,中国队以地主之谊走在最后。他们挥舞着旗帜,列队通过主席台,绕棒球场一周。开幕式后,第2届远东运动会各项比赛正式开始。

第2届远东运动会共设比赛项目25个,即100码、220码、440码、880码和1英里跑,220码低栏、120码高栏,跳高、跳远、撑竿跳高、掷铁饼、掷铁球,半英里、1英里替换跑,8英里长跑,40码、220码、440码游泳,10英里、20英里脚踏车比赛,网球、棒球、篮球、排球、足球比赛。设有表演项目7个:全国童子军大操、斥候飞艇、放风筝、造幕、救护、筑桥、取火竞射。为期7天的运动会·民众踊跃观摩,特别是运动会的最后一天比赛,观众达到2万余人。“场地四周,几无隙地”。为了方便各地观众到上海观摩,运动会期间。沪宁铁路局每日午后特增开了三趟专列,直达会场。第2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共派出了200人的队伍参加比赛。其中还有不远万里来自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棒球队,前来代表祖国参赛。比赛结果:中国在田径比赛中共夺得5枚金牌、13枚银牌、5枚铜牌,获41分,名列第一。菲律宾第二,获39分。日本队第三,获11分。在游泳比赛中,中国以28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日本为第二名,获12分。菲律宾为第三名,获11分。其中最优秀的游泳选手是中国的李罗伯,他一人独得220码自由泳、100码仰泳和220码俯泳的金牌,以及440码和1英里游泳的银牌。除田径、游泳外,中国队在本届远东运动会上还获得足球冠军、排球冠军。特别是足球,以后的中国一直稳坐在历届远东

运动会冠军的宝座上。最后,中国队以92分的总分,获得第2届远东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名。菲律宾为第二名,共获得74分。日本第三名,得32分。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国的胜利召开,以及中国队在这次大会上所取得的优秀成绩,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正如1915年5月13日《申报》所云:“此次大运动会,开中国自古以来未有之奇观。”

总统捐赠远运会

考察第2届远东运动会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对当时政府工作的促动。一是当时的内阁政府为了表示对新事物的支持,确实表现了对远东运动会的重视。据1915年3月31日的《申报》记载:“赞成此次运动会的有袁大总统、黎副总统、周自齐总长、蔡廷干上将、张季直总长等。”更有社会名流对大会的直接参与,如“总干事长为伍廷芳,加拿大柯兰克为名誉书记员,聂云台为名誉会计员,而唐少川、钟紫垣、张伯苓三君为干事。”为了解决中国参赛运动员的选拔、训练等经费的困难,袁世凯还带头向担任本次大会总务工作的柯兰克经理捐助了2000银元,同时向代表国家回国参赛的美国檀香山华侨棒球队,提供了500银元的旅费资助。袁世凯还向大会捐赠了十项运动的冠军奖杯一座,图案为“中国牌楼式”。副总统黎元洪,亦向大会总务捐赠了1000银元。

在他们的带动下,铁路部门提出了要让“火车直达远运会场”的优质服务,表示了交通运输部门对大会的支持。普通市民则积极地购买入场券,以作为自己对大会的一点贡献。当然,最努力的还是广大的体育界人士。据说当时全国各地的青年会主要人士,都聚集到了上海,这其中既包括青年会中的外国体育专家,也包括当时许多在青年会工作的中国学人,他们负责训练、会务、裁判,积极地参与了这项历史性的工作,保证了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国上海的成功举行。

二是在第2届远运会的影响下,政府对教育中的体育问题显得更为关注了。例如在袁世凯1915年《大总统颁定教育要旨》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从而要求“国民教育者,于德育智育外,并重体育”。在1915年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中,提出现时教育最大之缺点有四:一不重道德,二不重实利,三不重尚武精神,四不切实用。所以提出,教育要“以道德教育为经,以实利教育、尚武教育为纬。以道德、实利、尚武教育为体,以实用主义为用。”并特别解释了“尚武教育,以自初等小学注重体育卫生·加以军队束伍进退之法为始”。为了使这些政策要求能够很好地落到实处,1916年,政府还分别颁布了《高等小学校体操科教授要目草案》和《初等小学校体操科教授要目草案》,以指导各地的实践。江苏省政府甚至在远运会一结束,就委托上海的江苏教育会举办体育传习所,省政府还同时要求各县建立公共体育场,以满足社会体育的发展需求。

当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内政府对体育的关注,更多地还是站在军国民

教育的立场上。提出的是“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这样的一种认识,直到1919年,才逐渐有所改变。政府开始提出了“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的新的教育理念。而健全人格的四个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强健活泼之体格”。

体育救国论

第2届远东运动会召开之时,正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日,在民主与科学的主旋律下,人们纷纷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救国主张。诸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音乐救国、医学救国,等等。其中也有人提出了“体育救国”的主张,认为要积极改善中国人的体质,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所以,如果说1915年之前的中国,体育运动比赛还只是体育界的事,是少数人的事的话,那么,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的召开,却打破了这种沉寂的局面。

首先是全社会表现出对体育赛事的普遍关注和兴趣。例如当时的交通部门,为了让更多的上海市民便于去运动会场观摩第2届远东运动的比赛,研究决定从“本月15号起至21号,每日下午2点30分、1点10分、2点15分,由沪宁车站开加车3次。赴会者可乘外园路、里园路电车到车站,乘坐加车可以直达运动场门口。回来加车下午5点15分、5点50分、6点15分,亦分3次由运动场开回。车票每次1角。”一些教育机构,也借上海召开远东运动会的东风,想好好地推动一下本地区的学校体育工作。例如江苏省教育会就曾借此发布了一个“省教育会注重体育之通告”,其中说:“顷得本会干事员杨君心一报告,远东运动大会于本年5月15号至22号在上海举行。此会关于体育甚钜,各处学校及有多体育者,皆宜前往参观,以资研究。查该会四年举行1次。上次在菲律宾,下次在日本。此次幸在中国,而又当上海交通便利之处。诚宜联袂往观,藉观盛况,用亟通函,奉布尚祈。”

上海市民们更是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不仅对入场券的购买非常踊跃,据说当时无论是10元一张的可连续每天观看比赛的长票,还是1元一张的一次性入场券,都卖得非常好。其中最便宜的门票是每张小洋2角,可以入场一次,但没有座位。赛后为了庆祝中国运动员在第2届远东运动会上取得的好成绩,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提灯会”活动。市民们自备灯笼,齐集北苏州路中国公园,绕行英租界、法租界、民国路达张园,进行游行。各商家店铺也纷纷悬挂灯笼,以示庆贺。

其次,一些社会精英分子,在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同时,也纷纷将自己的研究目光投向体育。他们开始注意研究体育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注意研究体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最终形成了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学派——体育救国论。

体育救国的理论,最早当源于孙中山“强国强种”的体育主张。后来在1915年10

月15日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第1卷第2号上,由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首先提出体育中的“兽性主义”一说,使体育救国的主张得到了公开的讨论。什么是兽性?陈独秀解释说,兽性就是指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兽性就是指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兽性就是指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兽性就是指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陈独秀认为:西方列强何以能使其殖民统治遍布于世界?那是因为他们推崇兽性的缘故。日本为什么能称霸亚洲?也是因为他们推崇兽性的缘故。中国的情况呢?恰恰相反。“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所以陈独秀说,如果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心身薄弱的国民,又怎么能够担当起社会的重任而使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呢?“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穷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因而他提出:对于儿童的教育,在十岁以前,都应应以兽性主义为要。

紧接着1917年,又有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别名,在《新青年》杂志的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的论文。

毛泽东(1893-1976),又名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五四”运动前后,每个中国人都在努力探索着各种各样的救国救民的道路。正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和工作的毛泽东,同样也在考虑着这一问题。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人常常被帝国主义者蔑称为“东亚病夫”。所以当时的毛泽东曾一度把目光放到了走“体育救国”的道路上。他在《体育之研究》的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而究其原因就是在有关体育的问题上,那些提倡的人不得要领,未能掌握体育的根本,因而一直没有获得体育的实效。他认为:体育虽然和德育、智育共同构成了一个育人的整体,但是它们的关系则是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因此他说:体育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实在是处于第一的位置。因为只有在身体强壮的基础上,学问和道德才能获得久远的效果。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人们对体育本身的正确理解也是很重要的。他说:一定要弄清楚体育到底是什么?他的理解是“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这就是说:体育的本质在于“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可见,毛泽东对体育的这种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深刻的。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体育锻炼的实效呢?毛泽东的研究认为:一是要有锻炼的自觉性。他说:要想获得体育锻炼的效果,必须有积极的参与意识,要主动进行运动,自觉进行运动。二是要有体育运动的恒心。要将体育锻炼作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行动上持之以恒,观念上常动不懈。三是要充满兴趣和快乐。“兴味者,运动之始;快乐者,运动之终。兴味生于进行,快乐生于结果。”所以运动中的兴趣和快乐也是重要的。

由此,他对当时学校体育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比如体育课程设置,“多有形式而无实质”的问题;体育课教学时,“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的问题;以及教室光线不足、学校不讲卫生的问题,等等。总之,毛泽东认为:体育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使人“身心并完”的作用。因此国家提倡体育,从对个人来说,则可以“养生”;从对国家来说,则可以“卫国”。所以他主张通过发展体育,走“救国救民”的道路。

就在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论文的同时,另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先进青年恽代英,在1917年的《青年进步》杂志第4期上,也同样发表了一篇重要的体育研究论文《学校体育之研究》。

恽代英(1895-1931),江苏武进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青年领袖。1917年前后,恽代英正在武昌中华大学学习和工作。当时他对体育的关注,更多的是站在学校如何关心全体学生的健康这一角度上。他说:学校是不能不重视体育的,关于这一点似乎不需要再作更多的解释。但是学校对体育的重视,应该以什么为目的?这在理解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有的“以行军国民教育”为目的;有的“以保卫学生之健康”为目的;有的“以此为每年运动会惟一之预备”。恽代英认为,学校体育的目的,应该加以澄清。他的理解是:学校体育,就是“保学生健康”。对于各学生,无论其体质强弱,应平均加以注意。而不是除了固定的体育课程以外,就再也不关心他们的体育生活,不提供体育活动的空间,把仅有的注意点全部放在那些有运动能力的人身上,放在几个运动员身上。以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学校名誉飞扬”。

恽代英对当时学校体育中比较普遍存在的“军国民体育”和“选手体育”的做法,均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说,军国民体育就像是军队鞭笞教令中获得的学问,根本无科学而言,无思想理论而言。其结果是学生对于体育与健康身体之间的关系,毫不知晓。至于选手体育的危害,则是让更多的人“骛于虚荣”,只追求运动成绩的高低,而丢掉了学校体育的根本。所以他指出:中国学校的体育,必须认真研究怎样进行改良。他认为:一定要将那种零碎的体育,改为具有系统知识的体育;将那种运动强度过大的体育,改为具有适宜运动负荷的体育;将那种枯燥乏味的体育,改为具有浓厚兴趣的快乐体育。他甚至向当时的学校体育工作者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和措施。例如学校要加授生理卫生学的问题;要像北京的清华学校那样,定期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的问题;要增加学生体育锻炼时间的问题;要提倡在学校中多开展田径、球类运动的问题;要注意运动安全的问题;以及“女学之体操,不应与男子学校同一宗旨,同一手续”的问题,等等。总之,他的这些理论和认识,对当时中国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的发展,曾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指导作用。

正是在远东运动会的影响下,在—批社会精英分子的高度关注下,中国学校体育开始在这一时期发生重大的变化。即学校在设置体操课程的同时,也吸取教会学校的普

遍做法,广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而且,在课外体育活动中,又主要实施的是田径、球类等近代运动项目。这就使学校体育由过去的单纯体操课,逐渐向体操课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形式(即所谓双轨制)过渡,从而最终导致1923年兵操内容彻底在学校体育中废除。

体育爱国热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条件,向袁世凯秘密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开,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和所有爱国人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抗议之声四起。5月9日,袁世凯卖国政府竟背着中国人民接受了“二十一条”,继而全中国掀起了反对袁世凯卖国、反对“二十一条”的声势浩大的斗争。第2届远东运动会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在中国上海召开的。然而,与反对“二十一条”的政治斗争所激发起的爱国热情不同,第2届远东运动会所唤起的民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则主要表现了以下一些内容。

首先,它让国人看到了全国上下齐心合力的力量。例如从第2届远东运动会参赛的中国运动员情况来看,他们分别来自京津沪粤全国各地。其足球队、棒球队、游泳队主要来自南方地区,表现了南方的体育特色;而田径中的赛跑运动选手,则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北方地区,表现了北方的体育特色。正是中国南北方地区优秀运动员的强强联手,才在远东运动会上取得佳绩,一举夺得总分第一的好成绩。所以王正廷在《观第二次远东运动会之感言》的文章中说:“众擎易举,一木难支”。他以中国足球队在远东运动会上夺得冠军的事实为例说:场上的十一名运动员,只有相互的默契配合,才有获胜的可能。如果只凭一个人的技术力量在场上横冲直撞,恐怕不仅不能取胜,连称之为足球也不是了。所以王正廷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运动员之所以在远东运动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带给国人以希望,正是说明了“全国合力之效果”。

体育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当更需要团结合作的精神。王正廷说:大凡国家之事业,国家社会之服务,必须团结一致、联合作战,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国人应从体育比赛中得出这样的认识:“百钧之石,一人举之,不能动也;若集三四十人而异之,虽百里不难致矣。”只要能联合全国上下的力量,中国人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

其次,它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由于远东运动会的召开,既“能鼓舞体育精神,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又“能增进朋辈竞争之愉快,联络东西交际之感情。”所以它让更多的中国人从第2届远东运动会的胜利召开中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即如王正廷在第2届远东运动会上的演说那样: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国际上有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也知道有些东亚国家的运动员,行将去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比赛。我们所希望的是欧美的这种运动大会,也能够我们的东亚地区举行,使我们东亚人也能“争露头角,与欧美人

士角奇斗胜”。

王正廷说,如果说过去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中国的文弱和劣势,看到的是为外人所轻视和欺侮,看到的是外交的失败和长期受人压迫、剥削的耻辱。那么,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中国运动员在比赛中所取得的优秀运动成绩,则使国人从“东西各国,著名女士来参观者不下10万人”的场景中,看到了“吾国独出奇制胜,捷足先登,大有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之概。”由此它向世界所证明的是:中国人只要不断地坚持救亡图存,不断地努力变革,改变自己的民族形象,那么,外国人蔑视中国人的心理,就会在根本上得到改变。

怎么图强?提倡体育当然是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王正廷说,中国文弱之风已经发展到了极点,所以才使国家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如今要想救国,“必先强种。既欲强种,非男女体育同时提倡”不可。这是因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母体不强,其子女必弱”。因此王正廷说,这次在上海召开运动会,我们特别邀请菲律宾女学生组成的两个运动队来华,为我们演习垒球的比赛,以开我国女子体育比赛之先导。可喜的是“沪上各女校学生,当时往观者甚夥”。她们必然会从中受到感染,而使女子体育获得发展。王正廷认为,只要“女子体育与男子体育同时发达,尚虑种族有不强者乎。”所以他在《观第二次远东运动会之感言》的文章中说:第2届远东运动会的成功举办,让人们看到的是“体育兴,则国必兴;体育弱,则国必弱。乃自然之势”的道理。它所告诉人们的是:这次在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获胜,正是中国体育振兴的起点。他说,过去中国人常看到的是体育赛场上的失败,使人不免悲观的感觉。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优胜,看到的是东亚各国在运动场上对我们的刮目相看,因此,如果他日我们与之奥林匹克运动会,亦不能不说有战败西人的可能。王正廷感慨地说:“近日沿途,见男女各生,仿行运动法者甚多,虽不必尽能如格,而其脑筋中若已印有‘运动必要’四字,其影响之由来,谁不指而目之曰:运动会之力。”认为这正是远东运动会召开后带来的新气象。因此他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的国家,人人有如此参加体育的态度和精神,“则来日之强,可操左券;其希望之大,岂有涯乎”。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走向强盛,走向伟大。

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对远东运动会的认识,更是对当时“体育救国”理论的一种充分的诠释。因为中国人从远东运动会中看到了“欧美国民注重体育,所以他们身健国强,今天中国人如果也能竭力提倡体育,那么用不了多久一定可以强健中华民族”的希望。感受到了自强不息的中国,将来能够在世界上占有胜利位置,并不是一种奢望,而是一种完全的可能。

女子体育新天地

尽管在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举办之前,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女学生参加体育比赛的报道。据1903年的《苏报》载:在一次参加拒俄运动大会的2000多学生中,上海

爱国女学和务本女塾的学生最多,也最活跃。由于她们的表现突出,所以被当时的舆论誉为中国女子“前途的代表”。在1906年的京师大学堂运动会上,虽然也看到了几位大胆的女生,和男同胞一起参加比赛。但是,她们是穿着包裹很严密的大袍宽裙入场的,到了比赛前的几分钟,女生们才将外衣脱下,春光乍泄,自己先羞红了脸。当然,最后她们还是勇敢地挥动玉臂、迈开玉腿,坚持在运动场上驰骋拼搏,与须眉一争高下,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飞跃。但这样的事,在20世纪初的中国毕竟是凤毛麟角。

然而,在1915年的第2届远东运动会上,由应邀来自菲律宾的18位妙龄少女,为运动会进行了女子棒球(实应为垒球)的表演比赛以后,她们那健康强健的体魄,秀丽大方的姿态,高超娴熟的技艺,充满活力的对抗,无不给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妇女界,确实产生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强大冲击波。

“妇女们要解放!”从此便成为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主旋律。运动场上从此也有了更多的中国新女性。我们看到,1916年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开展篮球活动,并和上海美适中学进行比赛。同年11月,浙江省中等学校举行第一次联合运动会,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宁属、台属、处属、嘉兴县立女子师范,绍兴县立明道女二师范,私立浙江女子甲种职业学校等七校女生参加了比赛。

所以,当1921年中国再次在上海承办第5届远东运动会时,我们看到,已有爱国女校、务本女校、中西女塾、勤业女子师范、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爱迪生电灯公司等19个单位的女生、女工、女童子军等2297人参加了为大会所做的团体操表演。看到了在国际性的体育赛场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的女性。而这与以往人们印象中的小脚女人,正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第六节 奥运与中国近代政治和民族精神

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便开始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中枢调控作用,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并不是政治运动,国际奥委会也不是什么政治组织。但是,正如萨马兰奇先生在《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一文中所指出的: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自1896年起每一次奥运会都是在有关政府的同意和积极参与下筹办的,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奥运会在各国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无论其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从1936年纳粹统治下的柏林,到1980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莫斯科;不论是在共和制国家,还是在根深蒂固的君主制国家都是一样。而且,每个年代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政治、社会、科学和技术方面进步的标志,而这一切都会对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产生重大影响。正是基于奥运会和政治力量之间这种关系,促使我们建立并加强了和联合国、地

区域性政治机构以及直接介入体育运动和青少年教育领域的政府间或非政府机构的合作。由此可见,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文化活动,它与政治之间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1894年巴黎索邦举行的恢复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大会上,在确定奥运会的指导原则时,顾拜旦就提出:政府的支持,是运动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并要求由国家选择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运动员,从而清楚地表明运动员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是一个国家形象的体现。顾拜旦重建奥运会的初始目的之一,就是试图通过参加体育运动振奋法国青年,通过国际体育比赛,培养他们对法兰西的忠诚与自豪。1896年首届奥运会结束不久,顾拜旦就在《奥林匹亚》一文中写道:“一个人在看到自己的俱乐部或学院在全国比赛中会感到一种满足。当他看到自己的国家获胜这种感觉将是何等的强烈!就是出于这些想法,我寻求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经过许多努力,我成功了。”

顾拜旦在奥运会的庆典中有意识地设计了被一些人批评为强化民族意识的仪式。如在开幕式上,运动员按国别入场;比赛中为获胜者升国旗、奏国歌,并且在运动员比赛的服装上印有国徽。他曾认为升旗是非常必要的政治教育活动,因为国旗是现代爱国主义的象征。把国旗升上胜利的旗杆以奖励获胜的运动员——这样就继承了古代的崇拜,而不需要重新点燃炉火。在1896—1914年间,奥林匹克规则还允许按照每个国家运动员的奖牌数,排列国家的名次。1908年伦敦奥运会首次公布各国得奖统计表,对以后各国进行这方面的统计或计算非正式得分产生了影响。所有这些,使运动员在奥运大赛中的表现,不可避免地与其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具有表示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象征意义。能否跻身于奥林匹克大家庭,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存在的一种文化标识。所以当奥林匹克运动走进古老的中华大地,在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地要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奥运梦”张扬中华民族精神

在讨论奥林匹克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时,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谓民族精神,是指维系民族生存、推动民族前进的精神。她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与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的思想品格和价值追求,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中华民族有着非常优秀的民族精神传统。华夏民族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精神传统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然而,当世界步入到近代社会以后,在伴随着西方文明血腥崛起的同时,中国的古代文明却悲壮地沉沦了、落伍了。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成了一座中国人民受尽屈辱和灾难深重的历史。什么英法联军、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哪一次战争不都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哪一次战争不都是使近代中国一步步地走向

了半殖民地的历史深渊。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开始认识奥林匹克运动,看到了奥林匹克运动能为世界各国(不管是强国还是弱国,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宗主国还是殖民地)在体育运动比赛方面,所提供的—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于是,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被激发了,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展示民族自我的窗口,看到了华夏民族也能走向世界的希望。尽管当时的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意义还知之甚少,但是,当时的中国人还是依然从对奥运会的最初了解和认识中,提出了“我们也要走向世界”的口号。

1907年10月24日这一天,有一位中国人在天津青年会第5届学校联合运动会的颁奖仪式上,在热情洋溢的即兴演讲中发出了以下的倡议:此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充满了希望。去年雅典奥运会期间,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技术水准很差,得奖希望渺茫,但他们仍然派许多选手参加。照此看来,我国也应立即成立一支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目前最需要的是加紧训练,指导运动员的技术水准,以便早日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人。他不是别人,正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体育家张伯苓先生。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1891年入北洋水师学堂,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1898年萌发教育救国的志向,并开始在家塾中尝试进行西式教育。从1904年创办私立学堂起,到1951年病逝于天津止。他将自己的整个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和体育事业。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南开大学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早期体育领袖。说他是著名的南开创始人,那是因为他曾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文学家老舍、戏剧家曹禺在美国合写的一首诗中曾有所云:“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畴,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而这个校长就是张伯苓。说他是著名的早期体育领袖,那是因为早在1910年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上,他就担任了大会的总裁判。后来在1933年的全运会上,他又担任过总裁判。他还担任过远东运动会的总裁判和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总领队。当选过华北体育联合会会长。更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奥委会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名誉会长和董事长。

张伯苓15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水师学堂。在这里,他最初接受了西方教育。初沐欧风美雨的他,开始了解世界大势,逐渐确立起“教育救国”、“体育救国”的信念。1898年,他毅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首先是在严范孙公馆负责英语、数理的教学,同时增加操身(即体育)课程。他依照水师学堂的体操用具,绘制哑铃及木棒图样,请木匠依样制作,供学生使用。练习跳高没有竿、架,他就用椅子架—毛帚,竿子升高,就垫书本。起初学生们脑后的辫子常常把竿碰掉,不免引起一阵哄笑,后来他们索性盘起辫

子、脱下长衫,跳起来轻松了许多。没有木马,张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排成一列,然后腾越。代为木马练习。这是西方体育活动第一次敲开中国塾馆朱漆剥落的大门,它比清政府《奏定学堂皇章程》中规定的学堂开设体操课要求提早了5年。

1904年,张伯苓赴日本考察教育,使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教育制度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于是回国后立即着手筹办建立新式学堂。不久,私立敬业中学堂(后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诞生,28岁的张伯苓任监督,即校长。1907年2月学校乔迁,并改校名为南开中学堂。从此,不仅南开的发展誉满天下,而且张伯苓的教育和体育救国思想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他常说:“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偏废。”但“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所以张伯苓在对学生提出的五点训练方针中,第一点就是重视体育训练。他说:“国民体育衰弱,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落,服务年龄短促,原因固属多端。要以国人不重体育为其主要原因。”因此他大声疾呼:“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人说南开的有名,一半得力于南开的教学与设备,一半得力于南开的体育。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张伯苓从来就将体育作为教育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1916年以后,南开的学生已逾千人,为了使每个学生坚持体育运动,张伯苓曾在学校努力推行“强迫运动”。对17岁以上和17岁以下的学生分别提出要求,凡百码、铅球、跳高和四百四十码的成绩均要达到学校规定标准,方为及格。为把学生吸引到操场上,他还积极推动成立学校、年级、班级的各类体育团体,经常组织各种体育比赛。所以从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运动选手,他们不仅在天津市和华北运动会上多次夺标,在全国运动会上得奖,还多次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取得好成绩。如著名田径选手郭毓彬,在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上曾获得两项冠军。又如著名的“南开五虎”篮球队,不仅多次获得全国冠军,享誉国内,还曾战胜历届远东运动会冠军菲律宾队,震惊中外。

张伯苓倡导体育,绝不是仅仅为了南开在全国显露头角,更重要的是为提高全社会的身体素质。亦如他自己所说:“苓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所以他的办学理念就是“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确实,回顾张伯苓先生的一生,他就是在这样的誓言中不断实践,不断走过来的。

正是在张伯苓先生首倡要参加奥运会的影响下,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竞技运动”的文章。文章介绍了第4届奥运会即将举办的消息:再过几个星期,伦敦举行一次盛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运动会。世界上没有一个运动会能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匹敌。并且提出:“中国到底要等多久才能产生一位真正有技术水准的选手在国际奥运会上得到奖牌呢?那可能是难以评价的问题。不过,

只要我们有信心,相信那并不是一件难事。国家有责任发展体育,不只是派选手到雅典参加奥运,而且要积极争取二年一度的奥运在中国举行。

同年8月,张伯苓被派往美国华盛顿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会后他顺道考察欧美教育。在伦敦,正赶上举办第4届奥运会,使他亲自感受了奥运会的盛况。回国后,在10月23日南开学校操场举行的“第6届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学生们通过发明不久的幻灯放映,惊喜地看到了伦敦奥运会的盛况。在那一张张的幻灯片上,既记录有开幕式上各国选手高举本国国旗列队入场的情景,也记录有不同国籍运动员同场竞技的场面,还记录有一些人们从未见过的运动比赛项目。幻灯放映使目睹的同学们兴奋不已、群情激奋。于是,他们自发举行起一个别开生面的奥林匹克专题演讲会。正是在这个演讲会上,有人不失时机地在演说中提出:我们应该派教练到各地去发掘人才,将来参加奥运会才是可行的。并最后提出了三个初始的中国奥运梦想: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胜利选手参加奥运?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胜利队伍参加奥运?

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邀请世界各国的选手到北平参加比赛?

这是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也是中国人的奥运情结。从此以后,它不仅推动着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了解、认识和初步的尝试,而且也激发起中国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通过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借助于奥运会体育竞赛的舞台,让我们这个久经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民族也能走向世界,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简直就成了当时中国人的政治呐喊。尽管当时的中国人可以说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内涵,还是知之甚少,甚至有着许多的误解,但它的那种最高表现形式——吸引各国选手平等地参加奥运会比赛活动的做法,却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目光。

正因为参加奥林匹克运动,能够借助体育的世界舞台而实现我们这个民族当时所需要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政治要求,以张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以,它很快就在中国大地上吹起了一股“奥林匹克风”。1910年10月18日~22日,在中国的南京,尝试按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模式,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接着中国又与菲律宾和日本一起,于1913年发起并组织召开了远东运动会。特别是1932年,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位运动选手角逐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实现了中国人的第一个奥运梦想;1936年,中国又有了一支运动队伍走进了柏林奥运会,实现了中国人的第二个奥运梦想。而一百年后的今天,北京终于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从而圆了中国人的最后一个延续了百年的奥运之梦。

刘长春单刀赴会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还表现在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这件历史事件上。尽管早在晚清时期,中国人就在民族精神的张扬下,有

了参加奥运会比赛的梦想。但是。从口号的提出到最后实现这一愿望,则经过了近30年的努力。而且就是这最后的实现,也可以说是道路曲折、风风雨雨。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驱使,大概也许还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才能实现这一民族的奥运梦想。所以1932年中国的首次参加奥运会,不仅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走向奥运圣坛的开始,而且也是中华民族自发的一场反对帝国主义阴谋分裂中国的政治斗争,是中国人爱国情怀的充分显露。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中国原准备派足球和田径选手参赛,但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以及政府对参加奥运会没有兴趣,而致计划落空。早在1932年初,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已经明确表示不打算出钱和派人参加第10届奥运会。所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只好作出了一个不情愿的决定:仍采取上一届奥运会的做法,即派一位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人士,出席观摩奥运会,而不另派选手参加比赛。

就在中国运动员眼看将又一次与奥运会失之交臂的时候,1932年3月从中国东北传出了一条重要消息: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扶植下的伪满政权,为了使“满洲国”得到国际社会在事实上的承认,他们决定利用这次奥运会举办的机会大做文章。其中的一个重要举动就是派东北籍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代表所谓的“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田径比赛。消息传来,引起教育界青年学生和进步力量的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要求中国政府表态,揭露日本军阀和伪满政府企图使世界各国承认“满洲国”的阴谋,同时希望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以示中国为世界奥运大家庭中的一员。但是,由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民间组织,他们难为无米之炊。所以,派遣选手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前提条件,就是要解决经费的问题。而就在此时,4月的伪满报纸上又登出了一则消息,说国际奥委会已接受了由日本代交的伪满政权参加奥运会申请,并要求“满洲国”准备好“国旗”和“国歌”,以备奥运会参赛之用。

这则消息传开后,全国群情激昂,特别是当时的东北大学学生、短跑名将刘长春,首先在天津的《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决不代表“满洲国”参加第10届奥运会比赛。他说:“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牛马?”

刘长春(1909-1983),沈阳大连人,著名田径运动员。他从小喜爱体育。15岁时,在参加1923年日伪举办的“关东洲陆上竞技大会”上,他就分别以11秒8和59秒的成绩,分别获得100米跑和400米跑的冠军,表现出短跑的天赋。1929年,他进入东北大学学习,并代表东北大学参加了第14届华北运动会,获得100米、200米和400米跑三项冠军,其中100米跑以10秒8的成绩创下了当时全国的纪录。以后他又参加了第4、5、6届全国运动会。在第5届全国运动会上,他又将自己的100米跑成绩提高到10秒7,并创下了200米跑22秒1的全国纪录。从1932年开始,他先后代表中国参加了第10届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别是第10届奥运会,他是作为中国的惟一选手参

加奥运会的,也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教于长春师范大学和大连工学院,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等职。1983年刘长春病逝,享年75岁。

如果因为经费问题而不能派出自己的国手参加奥运会,反而使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得逞,这是当时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绝对不能允许的事情。所以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东北大学体育科主任郝更生的努力下,爱国将军、时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的张学良先生,决定慷慨解囊,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以经费上的资助。因此,同年7月1日,东北大学体育系在北京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将派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以宋君复为教练员而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决定。并由时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的张伯苓先生,急电向国际奥委会正式报名。

郝更生(1899-1976),江苏淮安人,近代体育家。早年他曾在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体育干事培训班学习,毕业后任汉口青年会体育干事。1925年毕业于美国春田学院,回国后受聘为苏州东吴大学、北京清华大学教授。1929-1932年,任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主任,继任山东大学体育主任。1932年刘长春首次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运会比赛,原本由郝更生陪同前往美国参赛,但由于他当时已受教育部之聘出任全国体育会议筹备委员,并和袁敦礼、吴蕴瑞两位国内知名教授一起,负责起草《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分身不开,故而请郝更生的春田学院同学,亦是东北大学的同事宋君复担任教练,率刘长春赴美参赛。1933年,郝更生又被教育部聘为首任体育督学,直至1949年。此外,他还曾担任教育委员会常委,国民体育委员会常委,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中华体育学会主席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出席第11届、14届奥运会代表团的领导职务,以及1947年第7届全国运动会总干事。郝更生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重要体育官员,主持和参与制订了许多重要的体育法规,对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对推动中国学校体育的规范化建设等都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在学术方面,郝更生在北平曾主编过《体育》杂志(1927年5月创刊),并著有《体育与人生》(1925年上海青年会出版),《中国体育概论》英文版(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专著。其中对中国体育界学术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体育概论》一书。正像后人所评价的,他于1926年用英文编写出版的《中国体育概论》,是一部目前留存极少但很有价值的专著。这首先体现在它的开拓性: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发现比其更早的主要是面向外国人的中国体育的英文专著,特别是在当时西方体育在中国渐为流行之际,作者的这种举措是难能可贵的。再者,是它的史料性:该书上至黄帝,下至当时,全方位地探讨记述了中国体育的历史发展和当时状况;为当今的体育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贵的资料。其三,是它的学术性:本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我国体育界理论研究的水平,还多方面地体现出作者的独到见解,有些观点至今仍有学术价值。应该说,这样的评价

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

宋君复(1897-1977),浙江绍兴人,近代体育家。宋君复最早接触西方体育是在杭州惠兰中学求学期间,并且是学校篮球队的一名主力队员。1916年,他中学毕业后即以优异成绩考取美国公费留学。他先在柯培大学学习物理,毕业后又进春田学院专攻体育。回国后,他先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1930年在东北大学体育科教授篮球、足球、垒球、急救法、裁判法等专业课程。1932年,刘长春以惟一代表中国的选手参加第10届奥运会比赛,考虑到他不懂英语,而宋君复既是刘长春东北大学的老师,又曾留学美国,故被任命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教练,率刘长春前往。1936年,宋君复不仅参与了奥运会中国篮球队的选拔工作,而且以田径队管理的身份参加了柏林奥运会。1948年,他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员,又第三次参加了第14届伦敦奥运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君复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1953年去北京体育学院工作,历任系主任、副院长等职。1964年,宋君复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4届委员会委员,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1977年病逝。宋君复的著作主要有:《体育原理》(商务印书馆,1929年),《女子篮球训练法》(上海勤奋书局,1932年),《女子垒球训练法》(上海勤奋书局,1934年),《刘长春短跑》(上海勤奋书局,1932年),《第十届世运会各国著名田径选手电影姿势图》(青岛体育协进会,1935年)等。

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东北大学学生于希渭未能成行。最后中国只派出以刘长春1人为运动员的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比赛。

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自己的选手参加奥运会比赛,虽然只有一人成行,但由于是发生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件特殊事件,因而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大众媒体的普遍关注。首先是1932年的7月2日中午,时任北京市长的周大文先生设家宴款待刘长春,席间发表演说,并赠西服全套,外加美金5元,以示送行。

7月3日,刘长春一行到达上海,更是轰动了整个上海滩。7月4日下午刘长春来到中华体育场进行练习训练的时候,不仅吸引了大批的上海市民围观,还有众多的新闻记者紧随采访,来访的客人更是络绎不绝。7月5日,又有青年会总干事黄仁霖先生在八仙桥青年会的九楼,举行在沪各报记者招待会,主要由郝更生报告中国首次选派代表参加奥运会的曲折经过。7月6日下午,上海市体育界和新闻界,在四川路的邓脱摩饭店,为刘长春一行洗尘。7月7日晚,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持,邀请上海的24个团体近2000人于东亚饭店举行招待会,为刘长春和宋君复二人饯行。

7月8日上午,上海的天气格外晴朗,新关码头挤满了前来欢送的人群。当身着国徽服装的刘长春来到码头上时,人群立时欢腾起来,将鲜花和掌声送给自己即将出征的体育英雄。接着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先生,偕夫人一起到场举行授旗仪式。他右手执国旗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旗各一面,郑重地对刘长春说:我国此次派君参加世界运动大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